

◀ (上接6版)

利于秘密集会。比较上述4种船型，一大代表们开会所雇的只能是丝网船。据考证，丝网船早期是太湖一带的捕鱼船，其船主统称“丝网邦”。太平天国时期，一部分丝网船主改行，专做游览生意，他们的游船常来嘉兴、平湖、海盐等地经营。当地人一般仍称这种游船为丝网船，也叫“丝网快”、“无锡快”、“画舫”，又称“灯船”。丝网船做工精巧，结构考究，船上楹梁、檐柱、炕榻、气楼、屏门等处雕刻“八仙过海”、“二十四孝”、“渔樵耕读”、“忠孝节义”等内容，船匾有“天水一色”、“直上青云——唯一竞渡”、“四海往来——五河相送”等字样。这种船一般是冬去夏来，也有常年在嘉兴的，主要是供有钱人水上游乐，有时也会接一些搬家、嫁娶或外埠旅行的运输业务。

相比在城市改造中消失的鸳鸯旅馆，南湖红船则幸运得多，尽管它的原型在战争时期离开了人们的视线。1959年，嘉兴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央和省里都特别强调，建馆的中心就是这条红船，能否准确还原关系到建馆工作是否能顺利推进。“一定要弄清当年开会的船到底是什么模样。”当时在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委员会工作的董熙楷在回忆录里写道。为了收集有关船型、雕刻等更多的细节，他和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郭竹林专程赶往丝网船的制造地无锡，向船厂车间里的老师傅们取经。在征询了王会悟的意见后，筹委会先做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后根据董必武的回忆，增加了一只小拖船。外观造型无误后，工作人员再次赶赴无锡了解内部结构与装饰，最终敲定了复原红船的方案。承担造船任务的主要是嘉兴造船厂，相关单位和人员也在积极参与，比如当时无锡交通工具合作工厂的温和尚、温炳奎、徐步皋担当技术指导，嘉兴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陆松安负责与

船厂联络，嘉兴新华书店副经理孙毅管理物资采购。

1959年10月1日，一只新生的红船静静停靠在湖心岛岸边，它用一幕历史场景的演绎来庆祝新中国建国10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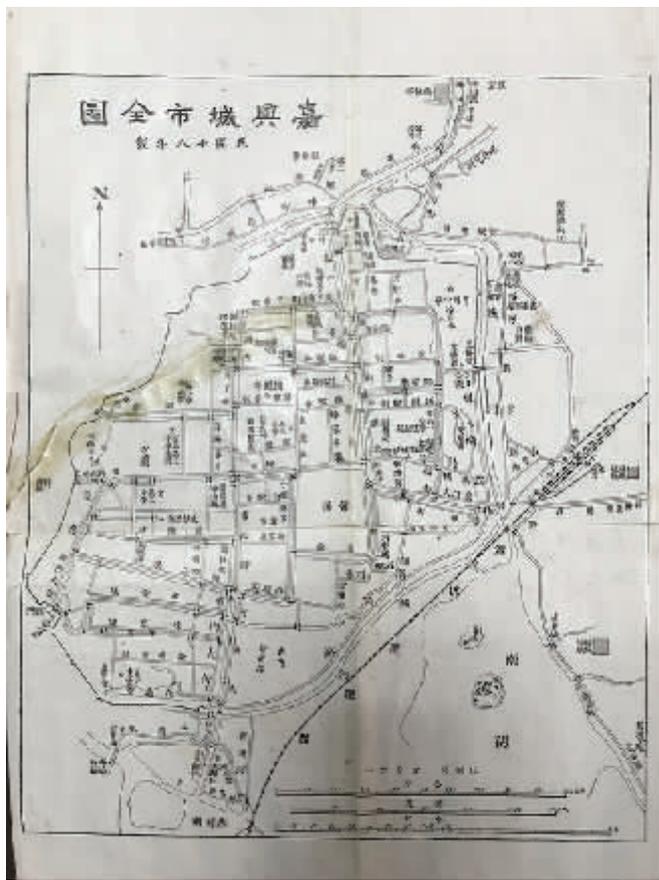
嘉兴续会比在杭州隐蔽得多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中共一大是一个整体的会议，从参会代表到议程内容都是连贯的。”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前执行主任陈水林一直从事红船历史研究，“没有上海6次会议的充分讨论，南湖会议不可能很快通过纲领和决议；但是反过来讲，没有南湖会议，中共一大就没有结果。”中共嘉兴市委党校副校长徐连林也是一样的观点，他说上海嘉兴两地的会议是一个历史事件，是统一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这段往事，在一次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上，陈水林撰文谈了“中共一大为什么会选择嘉兴南湖续会”，他认为嘉兴符合“交通便捷、安全有保证”两个条件。

对于陈水林的看法，第一点很容易理解，第二点则需要结合历史和时局两个方面。

嘉兴城自三国后即是嘉兴地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唐、五代以后，成为浙北重镇，至宋代已是两浙名城，“环城皆濠，有七十五桥三十五坊，舟车财货丰阜”。明代园林罗布，市肆兴隆，宣德年间被列为全国三十三个主要城市之一，有“江东一大都会”之美誉。17世纪，俄罗斯使臣米列斯库在《中国游记》中称嘉兴是浙江第二大城市。但从明末、清初至太平天国，一次次战乱使得嘉兴城市规模不断缩小，沦为不为人瞩目的小县城。当上海的形势不再适合继续开会后，一大代表



《嘉兴新志》与上世纪20年代的嘉兴城市全图

嘉兴市图书馆藏品

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杭州，但他们担心西湖人多眼杂，并且从上海去杭州的路途较远，费时太久，所以否定了这种方案。相比杭州，在嘉兴续会则隐蔽得多。在南湖租一条游船，闹中取静，以游湖为掩护，不会引起上层官僚和密探的注意。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那年夏天，嘉兴城的官僚们被省选弄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及其他。自1921年年初后，浙江发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联省自治运动”，核心人物之一是嘉兴人褚辅成。到了6月，褚辅成被选为省宪法委员会副议长，领导制订省宪法；7月，在制宪与选举孰主孰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省宪派和省选派发生了尖锐冲突。1921年7月22日的《申报》报道：“嘉兴本届省选，闹至今日，仍未办竣，近更愈闹愈大，双方各走极端，在办理选政者以省令难违，故曾分令各区依法举办。在选民方面，以主其事者营私舞弊，剥夺选民权利。现由褚辅成等发起，于十九日下午一时在城中讲演厅开选民

大会。是日天气炎热，褥暑熏蒸，选民冒暑莅会者约五六百人，公推沈钧儒为主席，登台宣布开会宗旨，继由褚辅成、田文渊等发表意见，并经到会选民公决对付办法……”到了8月24日，《申报》上又多了一条《省初选开票所冲突》的消息，“……其时选民褚辅成等，依据选举法，逐条责问，并言塘汇等区，不于十九日投票，延至二十日举行，应由何人负责……迨后，又据理诘责，警察即上前干涉，顿时人声鼎沸，长凳乱掷，枪柄横击，受伤最重者为计仰先顾一鸣等六人。旋仍照常开票，结果尚难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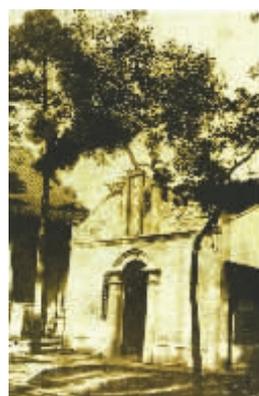
非代表王会悟“坐在前舱放哨”

李达夫人王会悟，在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我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地理环境。

我可以乔装成‘歌女’，在船头放哨。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比较安全。”当一大代表们着急地讨论何去何从时，王会悟提供了去嘉兴的建议并作出了解释。

“开会时非代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前舱放哨。”王会悟在回忆文章里详细讲述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情形：“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在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5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下午3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5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5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6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当时对南湖熟悉的还有邵力子，他后来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途转到嘉兴南湖开，当时也接受了我的建议。”邵力子祖籍绍兴，母亲是盛泽人，而盛泽与嘉兴接壤。不但如此，邵力子与嘉兴人褚辅成关系密切（中共一大之后，他俩因同去看望返沪的陈独秀而被巡捕房坐探捕去），所以当地也有传闻说，南湖会议的游船是由褚辅成家介绍提供。关于这一点，至今无法考证。



从左到右分别为：上世纪20年代的秀水县学宫、嘉兴图书馆、嘉兴教育局。